

ROAD OF CHINA

全球化阴影下的

◎房宁 王小东 宋强 等著

中国之路



封面封底地图说明：西方媒体竞相发表的一幅如何分裂中国的地图，暴露了西方欲分裂中国的长期战略图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房宁等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1

ISBN 7-5004-2620-8

I. 全… II. 房… III. 对外政策-研究-中国 IV. 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825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市昌平春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 25.00 元

DH54/34 51

编者的话

马利军 曹宏举

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热,以及随后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引发的、对真正阻碍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因素的深刻认识,相信读者会有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至今方兴未艾的、被媒体称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事态,并非几个“小平头”(季羨林先生语)振臂一呼,天下景从的结果。这个道理很简单,启发民意和被民意启发,区别只在于奇正的不同。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不是什么人(或者势力)能够鼓动得了和阻止得了的。承担本书主笔的房宁和王小东较早捕捉到这种青年一代思想状况的深刻变化,并与“说不”有着密切的渊源。他们1995年主持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是“说不”的先声及灵感来源。在小人物的呐喊造成巨大影响的前夜,那项取名为“面对‘圣徒的营地’”的思想调查及其重要性,事实上预兆了青年一代新的主体觉醒时代的来临——即其后紧随而来的90年代爱国主义的全面回归。交待房宁、王小东等与“说不”的因缘,一方面为表明编者的惺惺相惜之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读者介绍新书作者俱乐部形成的由来。

本书实际上酝酿已久,在5月8日的震撼之后,蕴积已久的情感终于有了一个抒发的新理由。我们希望的是,如果说1996年草

莽姿态的《中国可以说不》给了读者思索的契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提供了西方遏制中国的真实背景,那么,今天奉上的这部沉郁、悲怆的“新说不”将使每一位有爱国情怀和忧患感的人士的思考进入新的层次。“说不”俱乐部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编者的新聚合,也成为这个新层次最具说明力的佐证——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将集合更多有为的中国青年。

有时候,一种思想,特别是顽强地长存于头脑中的思想,其表现方式反而是平和的而非宣泄。如果一个观念本身就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大可不必为它遭误解(或有意曲解)而感到惶惑。作者房宁说,如果在有些“世界主义”者看来爱国是个罪名的话,那就请历史审判我们好啦。这样一种诚恳而顽强的思想,并不因突发事件后世界主义鼓吹者的花容失色而去自炫。对于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关注,并不仅是“说不”者所关切的。聊以欣慰的是有这么多真诚的学者和专家关心着这个重大问题。

因此,本书并非应景之作,而是持之以恒的精神劳动的结果。

难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自私自利的强权政治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吗?没有人高兴看到一个恶劣的世界安全环境威胁着中国的统一,没有人高兴寡义的西方列强逼压着中国人的强国梦想。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说不”俱乐部不见得比世界主义者更不热心。但是本书的使命在于把冷酷的国际关系本质剖析给大家看,告诉人们你们要警醒。这个道理跟吵架一样,吵架本身具有一种要去明辨是非的性质;外交也是如此,吵了谴责了,甚至打过了,最后的目的还是要求同。然则外交不仅仅是一种专家行为(信息时代尤其如此),如果温情脉脉的人类和谐在现阶段基本上不可能实现,那么,是不是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人们听听,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多问一个这是为什么?因此,“人民外交”思想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和格外富有意义,五·八事件后的抗议和论争难道不是体现了

“人民外交”的强大能量吗？这样的“人民外交”反映了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更成熟的世界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主体觉醒。它是一种进步，而不是自由主义“侠客们”所云的“倒退”。相反，“说不”俱乐部认为，回到那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时代，不讲国家利益，不讲庄敬自强，那才是真正的全面倒退。

正如本书指出的——

中国的爱国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非是冰炭不容的对立事物，对那些理论上属于人类思想发展总趋势的人权民主观，要放置于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看；在现阶段大唱超越民族利益，并试图超越现阶段中国人权观的世界主义高调，注定不为正直的中国人所欢迎。

苏联解体、亚洲经济危机、科索沃事件暴露的 20 世纪的深刻矛盾，证明了今天我们必须反思“全球化”的必要性。中国人必须避免从一种教条踏入另一类教条，富裕之邦并非真理之地，20 世纪形成的国际格局带来的后殖民主义的危险，必须以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逻辑起点加以认真应对。

“说不”俱乐部还着力于清算一度几乎成为知识界统治性叙述的“逆向民族主义”情绪和主张。也许读者会对这一部分内容感到惊奇。在中国，爱国主义居然成为问题，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一度被描述为对世界新事物充满仇恨心理的清教徒和反改革的帮凶，这也是需要正面回答的。“友邦惊论论”虽然已经没有市场，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危险来自民族主义”的论调还是具有蛊惑力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主张——哪怕是祸国殃民的主张，一出来就宣讲自己不忠君爱国。同样地，也没有一种爱国的观点，为其不调和的立场而感到心安理得。但是，不肯承认 90 年代爱国主义兴起是伴随着新的主体觉醒的积极意义，不愿看到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要求抒发尊严驱除奴性的普遍要求，每当这种正当的要求一

起来,就有人刻意用痛苦的联想来“警示”,用灰暗的前景来打压,这种心态不是对威权和物质的新的臣服又是什么?这种正在发生的新的偏见,唯独没有看到西方霸权才是文明的最大倒退,唯独没有看到后殖民主义才是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那么,有理由说,在五·八事件后出现的匆匆去浇灭“民族主义”微火的沥沥之音,才是现阶段必须加以警惕的虚妄的高调。

“说不”俱乐部是一贯主张唱民族正气之高调的(如果这也算高调的话),即便被学富五车的高贵的知识分子们讥讽为“群氓”也无怨无悔。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地位正在上升,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堕落,投降兴趣和维持会情结反而在高涨。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这种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质主义和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合法性班车,一讲国家利益他就说你爱人民,一讲反霸权他就说你留恋“冷战”。不要认为五·八震荡后在同仇敌忾的大气候中有人不吭声了(那是假象,本意还是要吭声的),就认为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破产了。不是这样,本书所提出的命题还要争论下去,只要我们还在走向世界,只要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没有停止,这个认知过程就没有完结。因此,提倡中国走向世界时中国人应具备的民族发展眼光和爱国精神,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此书编讫之际,从马其顿传来消息:战争已结束。我们仿佛又听到鲍勃·迪伦在《答案在风中飘》中对和平的追问:“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男子汉?”没有人会邪恶到希望用鲜血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在高唱地球村凯歌的今天,假如对帝国主义这种人类疾病的认识,还继续要帝国主义用行动来教育我们,那么,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自由解放的历史岂不要被我们所辜负?“落后就要挨打”不假,可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能不能从我们前辈用鲜血谱写成的宝贵经验中重新审视这样一个命题?这其实

是一个老问题：面对新的主体觉醒时代，中国人是否有必要重估现存的文明后果？

本书的开放性结构，使得书中充满了这样的追问。想到现在是一个预言盛行的时代，重申我们的“高调”，如果历史证明冲突与仇恨的未来格局只是杞人忧天，那么请付之一笑。

请阅读正文。

前言：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

喻权域

读到这部书稿，我感到欣喜。这是炽热的爱国主义与冷静的科学分析相结合而形成的著作。

这本书的几位作者找我写序，自称“青年作者”，并要我以此称呼他们，我觉得不妥。论年龄，他们都已超过三十岁，不能叫“青年”了；论资历，他们在学术界还算“小字辈”；而论学识和见地，他们已超过某些所谓“著名学者”，我更是自愧不如。怎样称呼他们呢？还是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标准，称他们为“青年学者”吧。

写作此书的青年学者中，有几位曾到美国、日本、加拿大留学，并在那里取得学位；有几位走出大学校门后在国内文化单位工作，长期与基层的干部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 80 年代中后期民族自虐狂潮泛滥时，有过疑惑；目睹苏联剧变的实际后果，他们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经济、政治的新形势，思想认识得到升华，成为坚定的爱国者。正因为他们著书写文章高扬爱国主义，他们受到海内外那些攻击爱国主义而宣扬“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人的围攻。这种围攻使他们经受锻炼，学识猛进，思想日趋成熟。

近代世界各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是青年学生（大学生、研究生）

和知识分子，俗称“知识界”。苏联剧变以后，特别是发生美国派军舰拦阻并搜查我国货轮“银河号”事件、我国申办奥运会因美国阻挠而失败之后，我国知识界产生了“两极分化”。

在青年学生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中，反霸、爱国的情绪高涨，这是多次民意调查证实了的，使美国许多人大为吃惊。另一方面，知识界中极少数顽固反对爱国主义、坚持“世界主义”，主张与西方大国“一体化”的人，也加紧活动。有的提出“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儿子、孙子的那个孙子），认为当初就不该反帝、革命，如果给西方某个强国当孙子，中国早就现代化了。有的宣称，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今年春，一位年纪不轻的人发表文章，宣称当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工人劳动剩余价值”，也“不是剥夺殖民地人民”。

邓小平同志 1985 年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92 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我国一些人却曲解小平同志的论断，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西方超级大国已经不搞侵略，不发动战争了。

今年 3 月，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悍然绕开联合国，出动上千架次战机狂轰滥炸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逼南联盟交出一个省。5 月 8 日，美国不顾国际法准则，发射五枚导弹袭击我国驻南使馆，炸死我国三名记者，炸伤我国二十名外交人员。

事实胜于雄辩。美国的导弹袭击，给我国知识界近几年的争论作了总结，谁是谁非已大白天下。十二亿中国人民愤怒了，一百万大学生拥到美国、英国驻华的大使馆、领事馆门前示威抗议，支持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在我国政府和人民强烈的抗议、谴责下，美国政府被迫表示“道歉”，并令其驻华使领馆为我国的死难烈士

下半旗致哀。我国那些反对爱国主义、主张“世界主义”的人一时傻了眼，哑了口。其中一些人有所觉悟，说是“上了美国宣传的当”，“被美国出卖了”。

然而，由于有国际资本的支持和鼓励，我国那些“世界主义者”沉默几个月后，又开始出来说话了。他们按美国霸权主义的宣传口径，硬说美国发射五枚导弹袭击我国使馆是“误炸”，是“偶然事件”，诬蔑我国那一百万去美英使领馆抗议的大学生是“群氓”，是“义和团行为”，是“反对开放政策”。

这几个月里，房宁、王小东、宋强、乔边等青年学者并没有闲着。他们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和思索：苏联解体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还要加强军事力量？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为什么还要对发展中国家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近几十年，世界科技进步很快，生产力大力发展，为什么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全世界竟有八亿人挨饿？

本书作者搜集了有关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大量材料、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所以要推行霸权主义，“更直接地运用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统治第三世界国家”，以维持“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局面。

这几位青年学者把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分为三个阶段：老殖民主义、“二战”以后的新殖民主义、90年代初开始的“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这个称谓是否贴切，也许还可以商榷，但是我认为，此书对“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军事控制、政治代理、经济接管）的分析和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提出的见解值得大家研究、思考，从而找出对付“后殖民主义”的办法，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并继续向前发展。

这本书可能存在疏漏不足之处,甚至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是,比起“世界主义者”们发表的那些信口开河,只有论点没有论据的“著作”来,这本书的份量要重得多。

读完这部书稿,我为这几位青年学者取得的成就高兴,也为我们伟大祖国有这样的青年学者而庆幸。

国家的前途系于青年。

80年代中后期苏联走向崩溃的前夕,苏联舆论一边倒,很少有人敢于挺身而出维护真理和正义,苏联青年基本上是跟着否定自身历史的那股狂潮走。经过几年,尝到了红旗落地的苦果,许多人才觉悟、后悔,但为时已晚。

我国则不然。进入90年代之后,大学校园里兴起爱国主义热潮,其中一些青年学子自发地组织起来,研究中国实际和世界情况。经过独立思考,一批自觉的爱国者在大学校园里成长起来。他们走出校园,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自觉地宣传爱国主张,探讨强国之路。他们年轻,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中西学识皆备,不是一顶“极端民族主义”帽子所能压倒的。

我国的青年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

1999年10月17日于北京

序：以祖国的名义

房 宁

1999年5月8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日子，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一次被西方欺负而遭受奇耻大辱的日子。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北约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孽，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起中国近现代史上西方老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本世纪的第一年，1900年，英、法、德、意、美、俄、日、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一般中国人都以“八”为吉利数字，其实“八”并不总是吉利的，八国联军的那个“八”就很不吉利。这次北约袭击我国驻南使馆的前一天，西方七国与俄罗斯达成原则上的一致，安排南斯拉夫这个小国的命运，完全重复了老殖民主义的典型作法。七加一等于八，上述八个国家中，如果将加拿大换成奥地利，正好是当年八国联军的那八个国家。

做这样的联想，只是想提醒读者朋友，尽管历史已经过去近百年，尽管中国人民已经站了起来，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整个世界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西方列强的本质并没有变，西方独霸世界、奴役世界的野心没有变。在世纪之交，在世界风云变幻之际，处于民族振兴关键时期的

中国人，在激愤之余，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地思考了。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使馆，绝不是偶然的，这一事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1995年，我出版过一本书《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其中对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做了一些分析、预测。文中引述了两位美国学者观点，他们指出：西方经济大国“同供应者纯粹的经济关系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政治力量总是以某种军事能力为基础，要维系一个贸易集团，或者使投资有保障，必须动用政治力量。很简单，把石油从想出售石油的国家运往想购买石油的国家，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书中分析指出：“从西方利益和立场上看，这两位美国学者的见解是非常精辟而深刻的，显然新殖民主义正日趋过时，西方正在走向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必定是对旧殖民主义某种程度的复归，是否定之否定的旧殖民主义，它将更多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政治干预、直接控制来保护西方大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以维系资本的国家大循环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维持西方生存的环境。”

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依“正、反、合”三个阶段发展。数百年来，西方的殖民主义看来也正在这一规律上，走向它的合题。对于老殖民主义，我们中国人是很熟悉了，其特征是以政治、军事强权为手段，赤裸裸地直接统治殖民地人民，剥夺殖民地的经济资源。这是殖民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按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应算是殖民主义的正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旧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瓦解，第三世界兴起，但是殖民主义并未从此灭亡，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泛滥于世。新殖民主义一反旧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直接干预的作法，他们主要以投资、贸易、技术为手段，参与第三世

后殖民主义更直接地运用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统治第三世界国家。

界国家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全球化,建立资本的国际循环体系,从第三世界掠夺大量的经济剩余。即: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新殖民主义给西方带来了战后的繁荣,维持了现代西方人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但是,广大第三世界却没有因为加入资本的国际循环,没有因为追随西方,而实现他们原先憧憬的西方方式的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西方资本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作为西方主导的资本国际循环积累对象的第三世界众多国家被边缘化了。

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落入了“发展的陷阱”。在加入资本国际循环之后,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资本积累的对象,工业化条件逐渐发生逆转,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有的被甩出了资本国际循环。“发展的陷阱”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场灾难,对于西方来说同样是致命的。新殖民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资本的国际循环。西方通过国际循环从全世界获取资源与财富,但其前提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循环。试想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美国的汉堡包卖给谁呢?发展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对西方同样是致命的,它正在阻塞资本的国际循环。新殖民主义已经不能继续维持西方在全球的利益了。

后殖民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趋势的。西方需要更直接地运用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统治第三世界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军事控制、政治代理和经济接管,迫使第三世界继续充当它的廉价产品的供应地,剩余资本和商品的消纳场和转移污染与废物的垃圾站。现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

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削平,即对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有望“晋升”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施遏制。采用经济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预、军事打击等手段,迫使其继续充当资本国际循环中的积累对象。近年来西方国家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利用人权外交频频敲打第三世界国家,国际资本集团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金融袭击,其目的都在于削平或削弱竞争对手。

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西方对其世界战略做出了新调整,使殖民主义向其三段式的合题转化——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科索沃危机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后殖民主义战略的实验场。科索沃的隆隆炮火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警报,殖民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殖民主义者的利剑在空中挥舞。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有被再殖民化的可能!

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若想避免被再殖民化的命运,就必须与西方做最坚决的抗争。不少同胞认为:要想不受西方欺负,就必须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把经济搞上去。大家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话都对,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未免失之简单。怎样把经济搞上去?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走西方的路,加入资本国家大循环,就可以渐次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实现现代化。结果怎样?西方绝不会允许第三世界国家跻身于它们的行列。

“落后就要挨打”不假,但是,什么是落后?我以为:比物质落后更可怕的是民族精神的失落,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矮化导致的弱势,是比单纯经济落后更难克服的整体性的文化落后。在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于西方经济不仅不会真正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反而会使发展中国家丧失自主发展的条件与可能,使其现代化的努力成为一种不发达的发展。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当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挣脱出来,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探索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及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就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问题存在着讨论。早些时候,这种讨论具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即姓“社”姓“资”的讨论。近年来这种讨论的分界线似乎消失了,有关“姓氏”的讨论也就基本上随之偃旗息鼓了。但是,在转换形式之后,讨论依然存在。近年来,讨论主要围绕着当代世界格局中的国家利益问题展开。西方与非西方的分层线描绘出了当代世界格局的基本结构。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的核心无非就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讨论。

毋庸讳言,向往西方、认同西方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一种时尚。为什么向往、认同西方?说到底是因为西方经济发达,西方富裕了。西方因何发达,怎样致富的?说到底是因为西方的社会制度好,西方的文化先进。“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是许多同胞之所以认同西方的内在的逻辑。

我们同许多朋友的分歧恰恰源于对“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的不同看法。我们并不一概否定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的价值。但是,把西方的富裕和文明归结于西方制度本身,归结为西方文化的合理性的看法过于简单、机械。坦率地说,“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